



铜仁学院学报编辑部 策划
铜仁学院红楼梦学会

- 「红学」勿反《红楼梦》
- 《红楼梦》是怎样成书的
- 徘徊中的红学
- 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的集大成——清代红学批评述评
- 胡适的「自叙说」评议
- 「钟鸣鼎食之家」的「末世君子」——红楼梦人物论之贾政论
- 悲喜千般同幻渺——甄士隐之「隐」与贾雨村之「存」
- 从「曹雪芹忌日」谈《红楼梦》脂批及相关问题
- 畸笏与脂评本

红学大观园

◎段振良 郭征帆 主编◎



贵州大学出版社



铜仁学院学报编辑部 策划
铜仁学院红楼梦学会

红学大观园

◎ 段振良 郭征帆 主编 ◎

贵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红学大观园 / 段振良, 郭征帆主编. — 贵阳 :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7-81126-067-8

红… II. ①段…②郭… III. 文学—红学研究—

文集 IV. G649.287.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0812 号

红学大观园

编 者: 段振良 郭征帆

责任编辑: 张三白

设计制作: 甘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贵州大学出版社

印 刷: 贵阳快捷彩印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40×170mm

印 张: 20.5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6-067-8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851) 8292951

序 言

在浩瀚的文学苍原中,《红楼梦》仿佛是最难穿透的一片莽林。

所谓“红经”,原本是一句戏言,而今戏言不戏,果然就成为一部很难解读的文学大经典。排开作者的身世、版本的纷纭、手法的特异不说,仅就其主旨而言,即使索引派之种种一概不算,有影响的就有自传说,爱情说,色空说,家世败落说,梦幻说,混沌美毁灭说,政治历史说等等,其中政治历史说又分补天说与破天说,爱情说又分宝黛悲剧说与双峰并美说以及双重悲剧说。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一部小说的主题复杂到如此程度,似乎还不曾有过。人们不禁要问,只不过生活在曹家大院,只不过见了些风花雪月,只不过尝了些酸甜苦辣,只不过读了些儒道释文的曹雪芹,真有那么博大深沉么?

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无限生成意义的功能。而文学名著能不断地生成意义,并不完全根源于文本。当人们从鲁迅的作品中读出作者探讨国民劣根性的动机时,对于这些读者,也许《西游记》里的猪八戒之性格也就生成了同样的意义。但如果人们把探讨国民劣根性的褒奖赏给吴承恩,则恐怕成为吴氏的混来财。《红楼梦》之所以被革命家读出排满,被道学家读出了淫,被才子读出缠绵,被领袖读出政治历史等等,以及将来还会读出更多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实生活中的读者,这恐怕有西方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和“原型”理论的原因。其实,我们也可以说,不是曹雪芹创造了《红楼梦》,而是《红楼梦》创造了曹雪芹。如果我们说,中国人读《红楼梦》大多有似曾相识的生活感受,这话不假也不错的话,那么,从接受美学的立场看,《红楼梦》就不是曹雪芹个人的产物,曹雪芹却是中国人文化心理的典型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的思想感情有多么复杂,《红楼梦》就有多么复杂。

但是,《红楼梦》的研究仍然不仅仅是这个问题,它涉及到相关的诸多方面。要涉足红学领域,不仅需要良好的学养,还需

要吃苦耐劳的精神。红学家代代相承，但并无千军万马，只可谓不绝如缕。进入新时期来，红学再度出现活跃繁荣的局面，老红学家们痴心不改，新一代的研究者们爱“红”之癖一如贾宝玉。孜孜探索之中，红学确有进展。这一时期打破了红学定于一尊的局面，而形成了不因人取言，亦不因人废言，重建学术讨论平等自由的局面；这一时期在版本、作者研究方面，有了新材料的充实，尤其是运用当代电子技术的分析，对后四十回的作者提出了引起普遍重视的新观点；这一时期对《红楼梦》人物形象及整个艺术成就的探讨更加广泛和深入。当然，也有人感觉到红学几乎徘徊五十年，包括新时期三十年在内，只说了些前人说过的话。这可能是出于对红学研究突破性进展的期待，并无抹煞新时期红学研究成绩的意思。

这本论文集只是《铜仁学院学报》中“红学大观园”栏目五年间载文的部分汇集。其中对《红楼梦》的作者、版本、史论、批评、鉴赏诸方面无不涉及，可以看作当今红学全豹之一斑。书中文章的作者，有学力深厚的老一代学者专家，其中有的还是叱咤数十年的风云人物；有的是观念前卫、思想敏捷而又信而好古的青年学人。这样一本红学论集，除了有方便读者之利，抑或对当下红学也为有益。

尽管《红楼梦》是难于穿透的一片莽林，我们也不必责怪曹雪芹布下的迷阵太深，因为《红楼梦》又是一席享不尽的盛筵。况且，曹雪芹当初动笔时已说过“谁解其中味？”可谓言之有预了。然而，红学总是会深入前行的。应该说，二百年的红学研究成果已经接近曹雪芹的原义，并且如果曹氏有灵在天的话，在好些方面还会使曹雪芹大喜过望；当然，也不排除有好些让他哑然失笑的自作聪明。总而言之，博大深沉睿智的中华文化的传承人不会辜负这部伟大的文学巨著，能够给出足够深透的解读和评价。

段振良

2008年4月30日

红楼
综
论



目 录

序/段振良

红楼综论

“红学”勿反《红楼梦》/曲沐/1

《红楼梦》是怎样成书的？/蔡义江/9

徘徊中的红学/杜景华/38

《红楼梦》读书经/杜福华/47

贾府财经混乱积怨甚多时衰败的深层内因/王志尧/59

《红楼梦》对奴仆之间矛盾的描写及其哲理意义/张兴德/64

作者丛谈

曹雪芹三题——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四十周年/白盾/77

《红楼梦》后四十回非曹雪芹原著的又一论据

——对明义四首《题红诗》的新辨识/祝秉权/81

《红楼梦》后四十回中有曹雪芹的手笔/梅玫，阎大卫/89

曹雪芹生于苏州之我见——重读《曹家档案史料》有感/崔川荣/97

传神文笔足千秋——曹雪芹评传/郭征帆/103

红学史论

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的集大成——清代红学批评述评/苗怀明/113

胡适的“自叙说”评议/宋广波/123

梦中痴人

“钟鸣鼎食之家”的“末世君子”

——红楼梦人物论之贾政论/李希凡，李萌/135

悲喜千般同幻渺——甄士隐之“隐”与贾雨村之“存”/胡文彬/148

太君座上“清客”——《红楼梦》人物论之薛姨妈/李希凡，李萌/151

做官难改贪酷性？治学但见才智高

——从贾雨村的师官经历看古今用人观的乖谬/王志尧/160

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悲剧命运——曹七巧与王熙凤之比较/任庆馨/169

版本辨源

谬托知己的讹言——脂批三辨/欧阳健/177

从“曹雪芹忌日”谈《红楼梦》脂批及相关问题/刘广定/186

畸笏与脂评本/郑庆山/195

精华欲掩料应难

——论《红楼梦》的“碍语”，兼论曹氏全璧《红楼梦》的内容

及其演变成80回本《石头记》的原因/祝秉权/202

艺术探胜

书中指秘法亦复不少——《红楼梦》脂批以“美文”评“作法”谈片/石麟/219

惊人翰墨语言为上 醒世文章人物最先

——《红楼梦》人物语言的性格化特点分析/唐亚娟/231

从贾宝玉同其他主子间奴仆的霄壤之别看《红楼梦》的梦幻特征/王志尧/240

林黛玉与崔莺莺——论爱情的悲剧美和正剧美/顾雪松/247

光辉远照的场面描写——谈《秋爽斋偶结海棠社》/顾雪松/258

红学争鸣

也谈《红楼梦》中的“檣木”——与周汝昌、刘心武先生商榷/邱华东/265

拒绝林黛玉为媳是贾母的一贯原则/朱伟杰/274

红学杂谈

红学与诗学——读书漫谈十九则/朱贺述，正苍山录/285

同为老嫗 各有千秋——第七次《红楼梦》问卷调查/赵景瑜/290

贾政会转变教育方针吗？/朱伟杰/296

后记/郭征帆/303

“红学”勿反《红楼梦》

曲 沐

乍看此题，人们不免会惊讶：“红学”不是出于《红楼梦》吗？“红学”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为什么还会反《红楼梦》呢？“反《红楼梦》”的红学，还有必要存在下去吗？的确，这是当今红学研究领域的一大要害问题。提出这一问题的，并非区区敢出此大言，此乃红学泰斗，已故俞平伯老先生谆谆告诫我们的话。俞平伯在治红道路上艰难跋涉七十个春秋，其契契苦心执于寻微探秘，一生中经历过无数挫折与悔恨，左冲右突以挣脱“新红学”的羁绊，不断发现问题，不断修正错误，终于突破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使广大读者看到了他大智大勇的精神境界，使他的人格得到最充分的升华”（欧阳健语）。尤其发人深思的是，1978年到1979年间，他陆续写下了《乐知儿语说红楼》一组十九篇文章，这是“至关重要的，带有一生终结性的论述”（王湜华《简述俞平伯全集》），也是他晚年红学研究深层反思的结果。总题前小引云：“儿语者言其无知，余之毫学即蒙学也。民国壬子在沪初得读《红楼梦》，迄今六十七年，管窥蠡测曾无是处，为世人所嗤，不亦宜乎。炳烛余光或有一隙之明，可赎前愆欤。”可见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他在这组文章中鲜明的指出“红学”“反《红楼梦》”的实质，这是发人深省的，然而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有些人甚至有意回避，这是不应该的，也是回避不了的。现在让我们看看他是怎样说的吧。兹概述之如次：

一，“人人皆知红学出于《红楼梦》，然红学实是反《红楼梦》的。红学愈昌，《红楼》愈隐”（《从“开宗明义”来看《红楼梦》的二元论》）。怎样反《红楼梦》呢？文章指出：“真事隐去，必欲索之，此一反也。假语村言，必欲实之，此二反也。”（同上）。前者指的是“旧红学”索隐派，后者指的是“新红学”考据派。旧红学代表人物是蔡元培。他在1917年出版的《石头记索隐》中认为《红楼梦》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书中主要人物皆影射当时真人真事。新红学创始人是胡适。胡适1921年作《红楼梦考证》，提出“曹雪芹自叙传说”、“高鹗续书说”和“曹寅家世说”，这三大学说构成了新红学的主要观念，这些观念左右红坛近一个世纪，一直为某些人信奉至今，可谓影响大矣。俞平伯指出这两派虽“门庭迥别”，但

都把《红楼梦》当着信史来研究，都在索取《红楼梦》所谓隐含的“本事”。他说：“索隐、自传殊途，其视本书为历史资料则正相同。只蔡（蔡元培）视同政治的野史，胡（胡适）看着一姓家乘耳”，“两派门庭迥别，论证抵牾，而出发之点初无二致，且有同一之误会焉。”（《索隐与自传说闲评》）。这说明两派都是违反《红楼梦》小说的基本特点的。究其实质，从学术渊源上看，新旧红学都没有摆脱清代的考据学风。王国维 1905 年就指出：“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中之主人公之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红楼梦评论》）。俞平伯觉醒了，而有些人依然在此风笼罩下“以考证之眼”阅读《红楼梦》。所谓“真事隐去”、“假语村言”云云，实乃小说家言，岂可当真。俞平伯说：“将假语村言论，认为真人真事，虽在表面似乎有合，而实际上翻其反矣。陈独秀 1921 年作《红楼梦新叙》，针对新旧红学都将《红楼梦》作为信史研究的倾向，强调小说和历史的区别，提示人们应将《红楼梦》作为小说看待。应该说这是很有文学眼光的，可惜并未引起胡适等人的重视。蒋和森曾将曾雪芹的“假语村言”与巴尔扎克说的小说是“伟大的谎言”相提并论，认为二者“不谋而合”，这说明《红楼梦》小说故事主要是虚构的，不能拘泥于史实，应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它。俞平伯还说：

“我们应该揭破‘自传说’。所谓‘自传说’是把曹雪芹和贾宝玉看作一人，而把曹家跟贾家处处比附起来，此说始作俑者是胡适。笔者过去也曾在此错误影响下写了一些论《红楼梦》的文章。这种说法的实质是否定本书的高度的概括性和典型性，从而抹煞它所包含的巨大的社会内容。我们知道，作者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取材，加以虚构，创作出作品来，这跟自传说完全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俞平伯论红楼梦》第 873 页）

他曾多次检讨说：（自传说）“我深中其毒，又屡发文章，推波助澜。迷惑后人。这是我生平的悲愧之一。”（《漫谈“红学”》）。所以，“政治的野史说”也好，“自叙传说”也好。都是反《红楼梦》的，应该予以彻底否定。遗憾的是有些人对俞平伯的告诫置若罔闻，至今仍在宣称：“本人的‘红学’观点的核心即是‘自传说’。”（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总序》华艺出版社 1998 年版）。并笼统地提出什么“中国小说，本源与本质是‘史’，是史的一支”（同上第 69 页）的错误理论。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霍氏兄妹等人根据什么“带全部脂砚斋批语的八十回本《石头记》”，写出《红楼解梦》的书（已出四部），说《红楼梦》中隐含着—部惊心动魄的宫闱秘史：曹雪芹（即贾宝玉）曾钟情一个被买进府中的名叫竺香玉（林黛玉原型）的女子，曹家被抄后，此女被送进宫中，被雍正选为贵妃，又晋封为皇后，但竺与曹旧情难舍，便与曹雪芹合谋，用丹砂毒死雍正皇帝。如此云云，真不知作者是怎样从《红楼梦》小说中看出这么一个荒诞的故事来的。

还有的作家。居然不知小说创作为何事，也“纷然”考证索取秦可卿之真实出身者为谁，实在令人“甚不可解者也”。这些“研究”的实质便是否定现行百二十回程本《红楼梦》，其反《红楼梦》的用心昭然若揭。由此可见红学界思想之混乱，一直徘徊着抹不去的历史阴影，也说明俞平伯淳淳告诫的红学勿反《红楼梦》的话，多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二，更有甚者，自“新红学”之后，从版本上对《红楼梦》进行大手术，将好端端的一部完整的《红楼梦》给割裂了，“把向来看着一贯的东西忽地打成两橛”（顾颉刚语），将前八十回著作权判属曹雪芹，后四十回著作权谬归高鹗，形成一个版本（程本）两个作者的畸形状态。这个“曹著高续说”如此盘根错节，乃至时至今日仍难突破，书肆陈列的《红楼梦》本子，差不多都署着“曹雪芹、高鹗著，有的红学家走得更远，只肯定前八十回而否定后四十回，甚至将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对立起来，并扬言要将后四十回砍掉，“扔进字纸篓中去”，如此深恶痛绝！王蒙在《红楼启示录》中谈到他少年时代所受的影响，很能发人深思：

“《红楼梦》后四十回并非曹雪芹所作，续作许多情节与原作者的原意不符，这些情况的论点构成了阅读后四十回的极大心理障碍。少时多次阅读《红楼梦》，但每至后四十回便匆匆翻过，既是‘伪作’，何必看它！”

可见腰斩《红楼梦》的恶果。本来程伟元和高鹗说得很清楚，他们对《红楼梦》只是整理者和出版者，并未妄续《红楼梦》。他们自己的话最有权权威性，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的话。实际上旧红学不管是索隐派和评点派或者是续书派，他们都是《红楼梦》的整体论者，尤其是评点派，他们为维护《红楼梦》的有机艺术整体作过不少努力，如王希廉和张新之，都有许多精彩的论述。然而自胡适之后，只根据张船山诗注中一个歧义多出的“补”字和主观随意的“内容研究”，便贸然判定后四十回为高鹗“伪续”，于是形成一股否定和贬毁后四十回的强大逆流；有的人走得更远，甚至对前八十回也加以肢解，认定它是经过程伟元和高鹗“伪纂”，程、高也被诬为“历史罪人”了。多少年来，这种腰斩和反《红楼梦》的行为曾引起不少具有远见卓识的红学家的不满。吴组缃曾感慨地说：“若没有这个百二十回的本子，单凭那八十回，二百年来。这部书能如此为广大读者所传诵，那是无法设想的。”（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序）。张毕来也强调说：“《红楼梦》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能自毁长城”！他还说：“作为中国人从维护我们民族的宝贵遗产的权威性，从《红楼梦》诞生以来的巨人影响来说，我们今天如此鞭打它的后四十回并非是一种明智的看法。当然，人们不会因为那一位权威说了什么就立即把后四十回撕掉，真的丢到垃圾篓里。相反，大众仍然喜欢全本。这恐怕也是研究者的一种悲哀。”（胡文彬《红边漫笔·怀念张毕来教授》）。朱眉叔针对歪曲诋毁后四十回的种种论调，展开系统地条分缕析的批驳，并从十大方面论题证

后十回与前八十回的贯通一致。1957年林语堂在《平心论高鹗》一文中尽管没有突破“续书说”，但他尖锐地指山：“周汝昌提议，将后四十回割掉，扔入纸篓，请他把自己的一部割起，看八十回成什么东西。”其实，不管有的人怎样歇斯底里，扬言要把后四十回砍掉，但后四十回是砍不掉的。不仅周汝昌不肯砍，甚至连周汝昌当顾问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以庚辰本为底本出版的称之为“艺院本”的《红楼梦》，仍然得配上程甲本后四十回才得以推向市场，否则，有谁去看那个78回残缺不全、文字错乱的庚辰本呢！可是，有的红学家连这种起码的事实都不顾，依然执迷不悟，一味地大反特反《红楼梦》极尽腰斩《红楼梦》之能事。尽管胡适当年提出“曹著高续说”的四条证据，早已被推翻，但“曹著高续说”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二十年代初期，俞平伯在其《红楼梦辨》中，紧步胡适之后尘，通过对《红楼梦》内容的考察，反复论证“自传说”和“曹著高续说”，可谓“推波助澜”。然而，经过多次反复研究和认真思考，晚年终于觉醒了，认识到自己错了，完全错了。特别是在临终之前，他痛心疾首地以颤抖的手写下：

“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以辞达”（《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2期）

俞平伯是伟大的。这些石破天惊的活，明确告诉人们：不能再“腰斩《红楼梦》”，“自毁长城”，做“反《红楼梦》”的事了。应该确认程伟元刊印的一百二十回全璧本《红楼梦》真本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它是一个有机艺术整体，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全民族都应该维护它、爱护它，后四十回和前八十回一样，都是无法割舍和取代的。蒋和森曾说：“我曾有过这样的看法：英国人以莎士比亚自豪，说足宁可失去印度也不失去莎士比亚；那么，我以为也可以这样说，中国宁可不造万里长城，但不能没有《红楼梦》。”（1992年中国国际红楼梦研讨会《闭幕词》）。这说法当然是对一百二十回《红楼梦》的艺术整体来说的。

三，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有的红学家不仅“腰斩《红楼梦》”，而且将整部百二十回《红楼梦》说成是“假红楼”，诬之为“程伪本”，只承认十六回的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才是所谓“真红楼”，并煞费苦心写成《红楼梦的真故事》（周汝昌著），等等，如此糟蹋《红楼梦》。胡适1961年《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时就讲：

“我现在不但回到我民国十七年的看法：‘甲戌以前的本子没有八十回之多，也许止有二十八回，也许止有四十回’，我现在进一步说：甲戌本虽然已说‘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其实止写了十六回……故我这个甲戌本真可以说是曹雪芹最初稿本的原样子。”（《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329页）

庚辰本二十二回末脂批曰：“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实在匪夷所思。他们随心所欲，将《红楼梦》肢解得这样支离破碎，如果曹雪芹只写了十六回书，或者只

写了不足二十二回书，他还算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吗，还算是《红楼梦》的作者吗！难怪有人讽刺说：“一部伟大的《红楼梦》，被研究的不伟大了。”我想曹雪芹英灵有知，也会起而愤击的。这种诋毁《红楼梦》的行为也曾引起不少红学家的不满。朱眉叔质问道：“《红楼梦》被翻译成那么多国家的文字，宣传为足可与世界一流作品相媲美的伟大作品，如果百二十回本是假《红楼梦》，或是一部分是赝品，岂不是欺世盗名吗？这难道不是民族的耻辱吗？设若百二十回本是一部真《红楼》，那些佛头着粪的红学家，对他们在中外诋毁百二十回本的伟大声誉，在广大读者的思想中造成混乱，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呢？应当不应当正本清源呢？”（转引自《红学百年风云录》第407页）。这话说得好。他们一方面宣传《红楼梦》是“世界一流伟大作品”，一方面千方百计否定它并诋毁它的“伟大声誉”，这难道不是“佛头着粪的红学家”吗？难道不应当“承担责任”吗？遗憾的是这些人至今不知悔悟，所以俞平伯痛心他指出：

“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即讲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其结果变成‘断烂朝报’，一如前人之评春秋经。笔者躬逢其盛，参与斯役，谬种流传，貽误后生，十分悲愧，必须忏悔。”（《宗师的掌心》）

所谓“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我的理解并非指对《红楼梦》解读与鉴赏时认识的肤浅和领悟的偏颇，而是指违反《红楼梦》小说的基本原则，破坏、糟蹋和歪曲《红楼梦》小说的红学研究，如索隐派红学和胡适观念影响下的红学，也指那些“佛头着粪的红学家”，因为迄今多数人仍然没有突破胡适的学说，所以俞平伯才这样说。他指出的“断烂朝报”，即残缺不全之意，宋朝王安石对《春秋》经即如此评价的，如今《红楼梦》也被“红学家”们贬损成残缺不全的断片残简了，这是令人痛心的。俞平伯对“参与斯役”懊悔不已，感到“悲愧”，“必须忏悔”，而有些人却仍然执迷不悟，如果听信这些话，很显然，《红楼梦》也就不存在了。

四，由于脂批证实了胡适的“自传说”、“续书说”和“曹寅家世说”，因之脂本倍受抬爱，一时间，什么“脂学”、“曹学”、“探佚学”，相继出现，其热度之高，盛况空前。而且，这些所谓的“学”，都是在否定百二十回程本《红楼梦》的前提下进行的，真可谓“红学愈昌，《红楼梦》愈隐”。就拿“探佚学”来说吧，他们根据脂砚斋别有用心的片言只语，对所谓《红楼梦》“佚稿”，作出了五花八门的想当然的推测和猜想，其结论之离奇怪诞，使人怵目惊心！且拙劣恶俗的“后四十回续书”，也层出不穷。前些年人们批评的那些所谓“泡沫红学”、“龙门红学”，其实都是这种建立在主脱臆断、虚妄不实的“假说”的基础之上的，说它是“自欺欺人的伪科学”，该非不实之词。在“探佚家”的笔下，《红楼梦》被肆意糟蹋得简直不成样子了。曹雪芹地下有知正不知着何感想！请看看一位探佚工作者曾怎样描述探佚的“成果”和失误的：“红学界一度出现的‘探佚热’其社会效果

并不十分理想，甚至还有点令人担忧。探佚的结果，无奇不有。诸如宝钗再嫁给贾雨村为姨太太，在送夫充军北方途中，倒毙雪中；柳湘莲率农民起义军攻破京师；宝玉还俗或充军；黛玉上吊或投水；凤姐死后被奸尸，弃骸骨于荒野；湘云婚后性欲无度，致使丈夫脱阳暴卒；……如此等等，惊心动魄。情节之离奇，如读当代某些外国流行小说。”（蔡义江《论红楼梦佚稿·序》）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尽管“探”山的结果如此花样百出，但谁都说自己“探”的结果才是“真红楼”、“真故事”，才是最“理想”的；尽管“红学”研究已到了如此荒唐的地步，探佚者们仍然有介事，乐此不疲。而有的红学家还在一个劲儿地鼓吹说：这是“最有创造性、最有深刻意义的工作”（周汝昌《（石头记探佚）序》）。所以俞平伯深刻地指出：

“自胡适的‘宝贝书’（按：指《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出现，局面于是大变。我的‘辑评’（按：指俞编《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推波助澜，自传之说风行一时，难收覆水。《红楼梦》今成显学矣，然非脂学即曹学也，下笔愈多，去题愈远，而本书（按：指《红楼梦》）之湮晦如故。”（《甲戌本与脂砚斋》）

看来，俞平伯终于认识到脂本的危害，对脂本和“脂学”，是极为反感的。应该说，他是第一个怀疑脂本的人，1931年他对脂本就提出过质疑。此时对自己的“辑评”也是懊悔莫及，自觉上当了。占了谁的当呢？1985年俞平伯在《文史知识》发表谈话：“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所谓“上了胡适的当”，既指“自传说”、“续书说”，也指对脂本的迷信。颇为耐人寻味的是，五十年代有人批判胡适时何等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然而却全盘接过了胡适的“曹寅家世说”、“自传说”、“续书说”和脂本原本说、脂砚斋足雪芹亲人说，总之，全部接过了胡适的红学观点甚至更有过之。所以，俞平伯尖锐地指出：

（新红学）“开山祖师为胡适。红学家虽变化多端孙行者翻了十万八千个筋斗，终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虽批判胡适相习成风，其实都是他的徒子徒孙，胡适地下有知，必干笑也。”（《宗师的掌心》）

此语何其透辟淋漓，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呵！尤其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反《红楼梦》达到高峰时期：红学家们在胡适“新红学”观念的牢笼下，将面目不清的脂砚斋“奉为圣明”，将来路不明的脂本奉为圭臬，将庸俗低劣的脂批奉为金科玉律。于是，红学界出现“两个凡是”：“凡是与脂砚斋观点不合的都错，凡是与脂砚斋提供的‘史实’不符都斥。呜呼，哀哉！”（朱伟杰《俗读红楼梦》沈仁康序）。而且纷纷将脂本脂批整理出版，真可谓“下笔愈多，去题愈远”，而真正的《红楼梦》却被“湮晦”了，埋没了。“红楼梦真故事”，《红楼梦》的脂砚斋本子，充斥书肆，鱼目混珠，真假难辨，对人们造成了莫大的危害，尤其贻误青年！脂本文字错讹低俗，令人不能卒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作家苏

雪林女士对脂本极为反感，她说：“这部脂砚斋四阅八十回原本《红楼梦》，别字连篇（批语尤甚，很少三句不带别字），造句常不自然，遣词多轻重失当，有几回写得更坏，简直痍痍累累，伤痕遍体，令人不忍卒睹。（《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然而却受到她老师胡适的批评。脂批胡话连篇，不少人为其惑乱！诸如“凤姐点戏，脂砚执笔”等违背文学基本常识的胡话，竟使得不少红学家被骗弄得团团转，考证过来考证过去，始终得不出个所以然来，说明我们的理论实在贫乏。”徐迟1979年即尖锐地指出：脂砚斋“庸俗、轻薄、恶劣、凶狠。首先跳出来给《红楼梦》抹黑的就是他！只要不被偏见蒙蔽，任准都能看透这个老奸巨滑。”（《红楼梦艺术论》第132页）。由于徐迟当时尚未看出脂本的晚出和脂砚斋的作伪，所以他那些深刻而尖锐的话并未引起更多的重视。“江山代有才人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初，欧阳健通过对脂本的多方研究考察，以大量事实证明“脂本乃后出之伪本，而程本方为《红楼梦》真本”，可谓“震撼红坛”四川学者王珏指出：“冯其庸先生说：脂本系统在前……这都是客观事实’，不对！脂本出现于1927年，程本出现于清代乾隆年间。程本先于脂本而出现，这才是客观事实，这才是‘不能任意抹杀和改变的，因为谁也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事实。脂本于1927年出现后，被许多人认为先于程本，这是一种主观认识，而不是‘客观事实’。”（《关于红学大论战的哲学问题》载《明清小说研究》1995年第一期）。至于1927年之后出现的脂本，是否“先于程本”，根本就没有足够的事实证明这种“主观认识”，相反倒是证明它是晚于程本的事实却是颠扑不破的。所以真正反《红楼梦》的总根子就是脂砚斋，“红学家”们上了“胡适的当”，也最终“上了脂砚斋的当”。脂砚斋这个“红坛一怪”的神秘人物，给《红楼梦》结下一个又一个永远也休想解得开的“死结”。在其“烟云模糊”的惑乱下，俞甲伯深深感到“红楼迷宫，处处设疑”，他曾悟出“求深反感”的道理。他说：

“求深固佳，患在求深反感。若夫涛张为幻，以假混真，自欺欺人，心劳日拙已。以有关学术之风气，故不惮言之耳。”（《漫谈“红学”》）

这对那些“曹学”、“脂学”、“探佚学”之“学术风气”，说得是何等深刻！“以诗张为幻，以假混真，自欺欺人，心劳日拙”来形容这种“求深反感”的“曹学”、“脂学”、“探佚学”，是再恰当不过。这些“学”的研究结果，也如俞平伯说的那样：“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同上）。他深刻体会到在陷入迷阵时曾感到的那种难于开解的困惑：“我常说自己愈研究愈糊涂，遂为众所诋，斥为巨谬，实是一句真心话，惜人之不察。”（同上）。他所痛惜的“人之不察”，一是进入“红楼梦迷宫”的人跳不出“新红学”的圈子，二是陷入“新红学”误区的人不能理解他。这既是俞平伯的悲哀，又何尝不是当代红学家的悲哀与尴尬呢！然而，就是这种在脂砚斋惑乱下“求深反感”的反《红楼梦》的红学研究，却迷惑着很多人，

但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当代作家李国文说：“我不相信红学家们的妄想，似乎在曹雪芹身边，有一个类似团契性质的脂砚斋，构成某种批评家群体，在指导着他的创作……曾雪芹，这位文学史上真正的大师，还需要别人告诉他怎么写和写什么吗？那真是岂有此理之事”，“真正的文学作品，其创作过程是极其个性化、私密化的。曾雪芹在写《红楼梦》的过程中，不可能有一个全天候包围着他的脂砚斋集团。按红学家的想象，曹写出一回，脂集团轮流传阅一过，予以评点，曹再进行改写，是一条流水作业线”，“我为红学家心目中的曹雪芹一哭”（《上当的红学家》载《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四期）。说明脂砚斋的骗局，越来越多的尤其为深谙文学创作规律的人所识破。作家孙犁曾尖锐地批评说：

“曹雪芹一直到死，虽然写了这样一部名著，也不可能产生任何的名利思想。凭借这部书而得以名利兼收的是后来的红学家们。而这些红学家的工作，是多么忘本地掩盖和违反了曹雪芹的著书的意旨啊！”

“他们所做的工作，不是为了发扬《红楼梦》这部作品，不是帮助读者去了解这部书的主要思想和全部意义，不是总结或研究这部书的艺术成就，甚至也不是对这部书所表现的各方面的生活，加以恰如其分的注释和说明。他们所做的工作，总起来看，好象是要把这部书从广大读者的手里或心里拉出来，收回它已经发生的重大影响，而换给读者一些看来和这部书有些关系，而其实是无关大体的鸡零狗碎：或者引导读者作风马牛的索隐；或者拟出几个永远也猜不破的谜。这就是企图把读者从读过这部书后，自然而然产生的崇高有力的心境、沉重激动的情绪中拉出来，走到一个偏僻的甚至迷惑的境地去，使他们完全忘却这部书的可贵的艺术感染力量。”（《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3期）

这话说得多好啊！如今，重温俞平伯谆谆告诫我们的话，令人感慨万千，有谁能像俞平伯那样不计个人得失，敢于否定自己，勇于修正错误，追求真理，服膺善言，这样，在其一生惨淡的红学生涯中，不断发现，不断超越，终于突破了“新红学”的羁绊。他提出的“红学”勿反《红楼梦》的警世名言，使人大有“埽荡烟埃，斥伪返本，积年堙郁，一旦霍然”（鲁迅语）之感。实际上，也是告诫那些至今仍然迷信脂本，仍然在“新红学”误区徘徊的人们，该是觉醒的时候，切勿再反《红楼梦》，“反《红楼梦》”的“红学”必将引起愈来愈多的人们的不满。他对治红失误的揭示和对自己错误的痛心忏悔，使其终于达到了自我人格的完善和理论修养的最高境界，这是十分令人崇敬和赞叹的。今当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四十周年（暂从）之际，止我们缅怀俞平伯遗言，更新观念，努力进取，走出误区，开拓红学研究新局面。